

古人如何推动阅读？



（清）郑蛟《秋林读书图》轴（局部）

今年2月1日,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》开始施行,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全民阅读的全国性行政法规,全民阅读将提升至新的历史阶段。在推动大众阅读上,古人也有不少办法。能否从前人实践中得到启迪?本文试作梳理。需说明的是,古今差异大,不可硬套。读史重在领会其中智慧,“抄前人作业”应谨慎。

让善读者去推动阅读

古代帝王推阅读,常从自身做起。

宋太祖赵匡胤“喜观书,虽在军中,手不释卷”,他在后周当官时,有人向周世宗柴荣进谗:“赵某下寿州(今安徽寿县),私所载凡数车,皆重货也。”柴荣派人查验,“唯书数千卷”。柴荣问:“将军应坚甲利兵,要书干什么?”赵匡胤说:“我无谋报君主,读书可广见识。”

赵匡胤上位后,立“宰相须用读书人”的“祖宗家法”,此后宋太宗“日阅《御览》三卷,因事有缺,暇日追补之”,宋真宗“听政之暇,惟文史是乐”……受此影响,“海内文士,彬彬辈出焉”。

据学者张全明、张舜在《宋代人的读书风气与高雅境界》中钩沉,宋代民间读书风气盛,叶适称“今吴越、闽、蜀,家能著书,人知挟册”,甚至浙江青田山中亦“贫士带经而锄,里巷市廛所至,辄闻读书声”。

许多宋人读书是出于热爱,不是为了当官。欧阳修说“至哉天下乐,终日在几案”,学者赵季仁称“某平生有三愿:一愿识尽世间好人,二愿读尽世间好书,三愿看尽世间好山水”,朱熹称读书为“作好人而不是作贵人”“贪道义而不是贪利禄”。

清帝阅读也是从自身抓起。皇太极令功臣子弟“但有八岁以上,十五岁以下,俱令报名读书,不许姑息容忍”。

当时的教学方式近于折磨,即

“师傅读一句,皇子照读一句,如此反复上口后,再读百遍,又与前四日生书共读百遍,凡在六日以前者,谓之熟书。约隔五日一复,周而复始,不有间断”。小皇子从凌晨至日暮,除吃饭外,仅休两次,每次一刻钟,其余时间不得在院中闲走。

清帝读书多,甚至影响了清宫绘画,多位清帝留下吉服读书像(康熙、乾隆、雍正、嘉庆、道光、咸丰均有),成了独有的传统,其中既有冒充“君师一揆”(君师合体的圣王)的想法,也体现出“朕亦一书生”的自我定位。

招招喂到读书人的嘴边

读书人最知读书人需要什么。

好读者皆求全,但僻书难得,爱读书的皇帝会投入更多资源。汉武帝“建藏书之策,置写书之官”,所谓写书,即抄录罕见的书。汉成帝时,刘向、刘歆父子借此保留了大量珍本。隋朝时,大臣牛弘建议“分遣使人,搜访异本,每书一卷,赏绢一匹,校写既定,本即归主”,没想到学者刘炫骗赏,伪造百余卷古书,题名《连山易》《鲁史记》等,经人告发,被判死刑,却幸运地赶上大赦。

有好书,还要把好书送到读者手中,这就需要书市。中国书市雏形是“槐市”,即来自官方推动。据《三辅黄图》:王莽任宰时,建万间学生宿舍,“去城七里……北为槐市,列槐树数百行为队(隧),无墙屋,诸生朔望会此市,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传书记笙磬乐器,相与买卖”。

西汉末,扬雄说“好书而不要诸仲尼,书肆也”,意思是读书不契于孔子,等于书店那样只会陈列。

唐代书肆普及,李播任蕲州刺史时,阅李生行卷文,竟有自己应举时作品,问何处得来,李生答:“二十年前,实于京辇书肆中,以百钱购得。”

唐代有印刷书,标“京中李家”

“上都东市大刁家太郎”“成都府樊赏家”“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”“西川过家”等,应是书店名号。

普通读者买不起书。后唐宰相冯道等曾建议,令国子监精校《九经》并“刻板印卖”,廉价售予读书人,开“监本”先河。

读书人喜精印,好读的皇帝能准确抓住这一点。990年,宋太宗向各路官员遍赐《九经》,作为奖品;康熙将《几何原理》译成满汉文发给官员;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印成后,雍正“只赏给诸王与在廷大臣,实心办事、学问优通者始各赐一部”。

皇室倡读书,清代亲王多藏书家。富察昌龄家道中落后,藏书多人礼亲王府,富察昌龄是曹寅外甥,承曹家旧藏。怡亲王的“乐善堂”“大楼九楹,积书皆满”,编《四库全书》时,“藏书家皆进呈,惟怡府之书未进,其中世所罕见者甚多”,总计约6000种,晚清名臣、藏书家潘祖荫赞“怡邸所藏,无一不精”。

使旧文本焕发新活力

宋代书肆更普及。《清明上河图》中有店招写“书坊”,“书坊”自刻书称“坊本”。市场发展推动技术进步,活字印刷大增效率,宋廷及时跟进,一边认可民间出版,“自今民间书坊刊行书籍,先经所属看详,又委教官讨论,择其可者,许之镂板”;一边及时出台版权保护政策。

据学者苏丹在《中国古代版权保护考析》中钩沉,以监本《九经》为例,只有向国子监提出申请并被批准后,方可翻印,“申禁”即受官方保护,未“申禁”不受保护。苏丹认为,这符合现代版权的“有条件的自动保护”原则,与西方学者认为的版权保护源头——15世纪末威尼斯首次授予出版商曼利求斯出版特权,性质完全一样,“时间却要早近500年”。

宋代严惩盗版者,即“不遵约

束违戾之人,仰执此,经所属陈乞,追板劈毁”,所得返还版权拥有者。相关规定不只保护官方出版物,也保护民间出版物。祝穆(朱熹的弟子,家产占徽州一半,号称“祝半城”)编印《方輿胜览》等四部书籍,向官方申请版权保护,被批准,官方张榜表示,对翻版者将“追人毁版,断治施行”。

清代推进阅读时,发现说书在民间极受欢迎。

小说能普及,说书人发挥了巨大作用。康熙时费轩在《扬州梦香词》中称:“扬州好,评话晚开场,略说从前增感慨,未知去后费思量,野史记兴亡。”北方说书人中,“说三国”的艺人有康熙时的王鸿兴、清末的张岚溪等,后者曾入宫给慈禧、光绪演出。

雍正因势利导,雍正二年(1724年)颁《圣谕广训》时,明确提出用说书的方式推广。据学者李晗、王继红钩沉,《圣谕广训》作为道德规范读物,趣味性差,不易推广,但雍正允许宣讲者发挥,比如京话版将原文“方其未离怀抱,饥不能自哺,寒不能自衣,为父母者审音声、察形色”,改成“你们在怀抱儿的时候,饿了呢,自己不会吃饭。渴了呢,自己不会喝水。冷了呢,自己不会穿衣裳。你的爹妈,看着你的脸儿,听着你的声音儿”。生动、活泼,百姓能听懂。

改造后的《圣谕广训》得普及,且推动共同语形成,促进了白话的规范化。

将文本与声音、表演结合起来,使旧文本焕发新活力,在今天,推动阅读也应与大众娱乐方式结合,AI、短视频、Vlog的兴起不仅不妨碍阅读,还会促进阅读,关键看形式上能否突破,能否将新与旧创造性连接起来。

(据《北京晚报》)